

第一章 建国之始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在全国范围内的追歼国民党军的战斗仍在进行。大兵团、大迂回、大战役更显得惊心动魄；风卷残云中，蒋介石被迫逃往台湾。此际，中国人民更需要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下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然而，征尘未洗，马未卸鞍，一场战火又迫在眉睫……

第 1 节 追歼残敌的脚步尚未停止

朝鲜战争前夕才完成的西征——进军新疆

1949 年 3 月，西柏坡中共中央驻地。

具有历史性转折意义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这里召开。参加会议的第一野战军第 1 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王震，接到通知，要他马上到中央办公厅去面见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等领导同志。

见面后，王震详细向中央三位领导汇报了一兵团近来的各方面情况。

“王震同志，中央准备把进军新疆的重大任务交给你们，

你看如何？”周恩来听完他的汇报，神色严肃地说：

“太好了！”王震高兴得站起身来，激动地说：“我们一兵团保证完成任务。”

毛泽东说：“这可不是一般的任务呀，新疆问题我们要力争做两手准备，能和平解决最好，因此进军新疆是一个政治仗，只能打好。”

接着，朱德又就有关进军新疆的一些具体问题向王震做了交待，并告诉他有关行动计划向一野司令员彭德怀同志请示，由他统一指挥进军大西北的战斗。

一野遵照中央军委的决定，把进军新疆的任务交给了王震兵团及其所属的第2军和第6军，开始了对部队的各种训练和物资准备工作。

当年9月23日，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将军派出的代表曾震五将军来到兰州，洽商起义事项，受到了彭德怀的接见。

彭总握住曾震五的手说：

“欢迎你们能在此时刻，毅然站到了人民的一边！”

“报告彭总司令，陶峙岳将军已做好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他要我向您详细汇报。”

彭总与曾震五就起义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再次做了最后商定，要他尽快回去向陶峙岳报告。

1949年9月25日，一个历史性的光荣日子。

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将军，率所属部队加上驻新疆的联勤总部系统的物质供应局和空军地勤人员共计7万余

人，正式向全国通电起义。次日，包尔汉主席率新疆省政府委员，也发出了起义通电。至此，新疆宣告和平解放，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9月28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致电嘉勉陶峙岳、包尔汉两人，高度赞扬了他们的真诚态度和爱国壮举，并对他们今后的工作也提出了殷切的希望。

此刻，天山南北，戈壁高原到处传遍了和平起义的消息，410万新疆各族人民奔走相告，省会迪化市内人人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发出一片欢呼之声。各族人民随即投入了积极的准备工作，到处筹措粮草物资，以欢迎人民解放军进驻新疆。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就此向西北人民解放军发出命令：“尽快进军新疆，早日完成保卫和建设西北边疆的光荣使命！”

10月6日，一野司令员彭德怀从兰州赶到酒泉，亲自主持了第1兵团党委扩大会议，与王震一起部署了进军新疆的详细计划。

彭德怀在会上对全体师以上干部传达了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命令。他说：“新疆现在和平解放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但是新疆有5300余公里的边防线，这些边防线都亟待我军尽快去接管防守，还有七八万的国民党起义部队也需进行统一改编。同时，那里的敌对势力还在活动，一些国民党军中的顽固分子千方百计的要破坏和平计划。因此，我军必须用最快的速度，火速进军新疆，把它真正控制在我军手上。”进疆的主力于10月开始进军，明年3月底以前完成全部接防和改编起义的部队的工作！”

行动计划为：以战车 5 团附一个加强步兵连为先遣队首先行动，开进省会迪化；第 2 军的 4、5、6 三个师由 480 辆汽车分两路运送进疆；第 6 军则乘飞机和汽车飞速开进北疆、东疆和迪化，从而完成全部进军行动。

毛泽东对进军新疆极为关心，他曾亲自电示彭德怀：“凡由一野准备的事项，如粮秣、被装等应当抓紧进行。”为此，中央决定帮助解决 300—400 辆汽车、50 万块银洋及单独在新疆使用的人民币，并已商定由苏联民航派来 30 架运输机，另从华东军区抽调了 425 辆汽车，华北军区抽调了 100 余辆汽车，又从原国民党起义部队中筹集了 320 辆汽车，加上原一兵团自己的车，这样一共有 700 余辆汽车担任了进军新疆的陆运任务。此外，还有许多商车和近 5000 匹骡马也参加了此次规模空前的行动。

西北军民仅用 20 多天时间即筹集了大量的粮草衣物和御寒物质，多达几千吨，加上东北解放区军民的大力支援，我进疆部队的物质一切准备就绪。

1949 年 10 月 7 日，我战车 5 团首先西出玉门关，北穿星星峡，开始了向迪化市的挺进。

隆隆的战车 5 团在茫茫的戈壁上昼夜不停地开进着，我军指战员斗志高昂，克服了大沙漠大戈壁的干燥缺水、炎热不适等困难，向着新疆挺进。

部队按计划离开哈密后继续西进，翻越高山峡谷，穿过吐鲁番盆地和大戈壁，于 1949 年 10 月 20 日下午，胜利到达了迪化市，并在 3 天之内全面接管城防，控制了机场，保证了后

续大部队的顺利到来。

先于战车 5 团到达迪化的部队，为第 1 兵团第 6 军的部份先遣人员，他们按总部指示，乘坐苏联提供的第一架运输机于 10 月 10 日飞抵迪化，建立了空运的指挥机构。从此，一个我军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空运部队战略行动开始实施。

从 11 月 5 日开始，由苏联民航提供的 40 架大型运输机，将我一兵团指挥部、直属部队和第 6 军的一部分先后空运到了哈密、迪化等地接防。

到 1950 年 1 月 20 日止，先后由酒泉飞往迪化的空运飞机 543 架次共计 15000 多人。从酒泉飞往哈密的飞机 160 架次，空运部队 4185 人次。此外还空运了近 13 万公斤的物资进入新疆供部队使用，在这前后 700 余架次的运输飞行中，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故。

在整个进军新疆的行动中，我军还先后平息了发生在哈密、鄯善、吐鲁番、焉耆等地国民党敌特份子发动的骚乱，果断坚决地打击了顽固的反动份子，保卫了新疆和平解放的局面。保障了我军进军新疆任务的圆满完成。

从 1949 年 10 月开始的这次大进军，到 1950 年 3 月胜利完成。其正如彭德怀同志所指出的那样：“我军将士进军新疆冒天寒地冻、漠原荒野，风餐露宿，创造了史无前例的进军纪录！”

其时，就连彭大将军自己也没有料到，半年后，会有一场更大规模的进军在等待着他，那就是指挥百万大军——出兵朝鲜。

刚进城又“上山”

根据西南战局发展形势，刘伯承、邓小平于 1949 年 11 月 11 日和 21 日分别致电 3、5 兵团，强调指出：当前战役重心是截断宋希濂集团和敌 15 兵团向云南的退路，力求在长江以南将其歼灭。从战役全局着眼，从贵州迂回川南的部队极为重要。5 兵团主力和 10 军应确实计算行程和时间，加速迂回北上，求得先敌占领叙永、筠连、盐津之线，并进占宜宾，一部可自遵义取捷径直出川南泸县，截断川境敌守军退滇道路。3 兵团主力在綦江、南川一带，正面牵制宋希濂集团及国民党军 15 兵团，待 5 兵团主力和 10 军到达预定位置后，再向重庆外围运动，尔后协同 5 兵团西进作战。

据此，杨勇、苏振华决定，5 兵团主力和 10 军由贵阳、遵义分两路向川南快速迂回。兵团前卫 16 军于 25 日攻克黔西、大定（今大方），歼灭黔境敌守军 49 军一部，俘虏该军参谋长饶启尧；28 日占领黔西北重镇毕节，截断敌军由川经黔入滇的通道，之后北渡赤水河、翻越六盘山。我前卫团获悉国民党军第六编练司令部正向叙永退却时，立即轻装疾驰，于 30 日夜袭叙永城，俘虏国民党军中将司令官肖以党以下 2300 余人。12 月 5 日，该团先头部队攻占长江南岸纳溪等地。7 日，16 军主力渡过长江，进占泸州地区。18 军自滇东北的镇雄开始加快行程，取捷径直出川南，于 12 月 13 日进抵宜宾地

区。

我 10 军分两路向川南疾进。其左路部队，于 12 月 1 日解放赤水，继而消灭沿长江抵抗的川境敌守军 21 军一部，3 日晚进占泸县，4 日攻占富顺；接着，以日行 120 公里的惊人速度追歼宋希濂部 122 军一部，6 日解放荣县。在右路部队于 2 日抵达合江后，即于隆昌追击，沿途歼灭川境国民党军 15 兵团 44 军大部，6 日解放成渝线上的重镇内江。其先头部队乘势于次日解放资中。至此，5 兵团主力和 10 军，提前到达预定位置，控制了以宜宾、泸州一带的川南要冲和水陆交通枢纽，使我军既可南下康、滇，又可东出黔、桂。占领这一地区，就完全控制了川滇公路和川南长江通道，截断了川境国民党军南逃云南的捷径，对实现中央军委解放西南的整个战役意图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 5 兵团主力和 10 军进击川南的同时，进入川东的我军正向南川和重庆方向迅猛追击。3 兵团主力和 47 军，正把败逃的宋希濂集团和驰援的国民党军 15 兵团，分割包围于南川以北地区。经数日激战，至 11 月 28 日，歼灭宋希濂集团 20 兵团及 15 兵团的大部共 30000 余人，并乘胜解放了重庆外围城市綦江、涪陵和江津，为解放重庆创造了有利条件。根据西南战局比原先预料发展得快的新形势，二野前委立即改变了暂缓解放重庆的决心，命令前面的 3 个军，不顾疲劳，连续作战，加速前进，提前过江，解放重庆。47 军即由涪陵北渡长江，迂回重庆。12 军从重庆、江津之间渡江西进，直指璧山，向重庆侧后迂回。11 军进抵与重庆相望的长江南岸。值此，

我军各部队在粉碎国民党军在长江南岸的抵抗后，于 29 日，全面控制了东起木洞、西至江津的 50 余公里的江防重地，形成对重庆的包围态势。蒋介石深感形势不妙，于 11 月 30 日凌晨，带着从广州迁来不足 50 天的“国民政府”要员，匆忙乘飞机逃往成都。同一天下午，我 11 军横渡长江，解放了重庆市。重庆解放，使国民党割据西南的美梦彻底成为泡影。

重庆解放后，我军各部队随即乘胜西进，至 12 月 7 日，11、12 军先后攻占璧山、铜梁、永川等地，并进至内江，遂宁一线，47 军主力，50 军、42 军一部进占广安、邻水、垫江等地区。3、5 兵团两大主力靠拢，形成直捣成都，聚歼胡宗南集团的牢固态势。

蒋介石眼见国民党军大部被包围于成都地区，已极难得到挽救，故于 12 月 7 日宣布将其“政府”迁往台湾，委派胡宗南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参谋长代长官职，全权指挥川、康地区国民党军。而他本人则于 12 月 10 日乘飞机从成都逃往台湾。这时退集成都地区的国民党军的总兵力还有 6 个兵团 32 万余人。胡宗南为集中全力向康、滇方向突围和防止解放军割裂其部队，一面以主力 5 兵团坚守新津，并部署 18 兵团于新津、成都之间，加紧构筑工事，抵抗我军的进攻；一面将成都以北地区的 7 兵团南撤至德阳、三台地区，16 兵团置于什邡、广汉地区，50、20 兵团残部部署于彭县、广汉地区，向主力靠拢。当时，被围困的国民党军官兵异常惊恐，一片混乱。12 月 21 日，川鄂边区绥靖公署副主任董宋珩及 16 兵团副司令曾元率该兵团在金堂起义，预示川境国民党军彻底崩

溃的到来。胡宗南为稳定军心，匆匆于 22 日在新津召开紧急军长会议，提出“偏师东突，主力背进”的舍卒保车方案。由 15、20 兵团担任东突任务，于 24 日开始向重庆方向突出，吸引解放军二野主力回援，以保障胡宗南的大部队趁机向雅安、西昌一带突围。

就在胡宗南召开新津会议策划突围逃窜的前一天，刘伯承、邓小平下达了发起成都战役的命令。命令指示：胡宗南退路已断，困兽犹斗，必作最后挣扎，且尚有反击的力量和局部进攻的可能，绝非一两个冲锋所能歼灭，必须十分慎重，严防轻敌乱碰，千万不可进行无准备无把握的战斗。作战时仍用先打弱点，集中力量，割开敌军，一点一点吃的战法。特别要大力开展政治攻势，争取更多的国民党军放下武器。并决定由 5 兵团司令员杨勇和 3 兵团副司令员杜义德统一指挥两个兵团的所属部队。杨勇，杜义德遵照命令，立即调整部署，压缩包围圈，到 12 月 24 日，我 12、16、18、10、11 军在大邑、邛崃、蒲江至新津东南弧形线上接敌展开，对被围困的国民党军形成强大的军事压力。

面对人民解放军的四面包围，胡宗南在 22 日的紧急军长会议上还表示要同他的部下“同舟共济，共赴危难”；可一夜之间，他竟自食其言，也像蒋介石一样，电下他的部队，于 23 日爬上事先早已准备好的飞机，溜之大吉。胡宗南的逃跑，更增加了敌众多官兵的背离情绪。我军乘机紧缩包围圈，进行军事打击，开展政治攻势。前线各部队分别向国民党军指挥官发忠告、警告，号召他们迅速醒悟，勿失良机。前沿各分队，

则利用多种方式，向国民党军士兵喊话，送信，散发传单，规劝他们放下武器，弃暗投明。在我军强大政治攻势面前，被围的国民党军纷纷起义。24日，敌15兵团司令官罗广文、20兵团司令官陈克非率其残部在彭县起义。25日，7兵团司令官裴昌会率部在德阳率部起义。退到成都、双流一带的18兵团酝酿起义。唯独接替胡宗南指挥的国民党第5兵团司令官李文仍执迷不悟，欲继续顽抗。李文为使自已免于更加不利的地位，赶忙改变胡宗南规定的突围计划，于24日黄昏，集中7个军的兵力，在炮火掩护下分两路开始向雅安突围。其左路1个军沿新津河岸经蒲江、邛崃之间西突；右路以主力4个军沿新津至邛崃公路经邛崃南侧西突；另以1个军在新津担任掩护，1个军向邛崃方向佯攻，牵制该地我军，掩护主力突围。这一夜，敌突围部队处处遭到我军预有准备的勇猛阻击，损失惨重，不得不败阵收兵。

杨勇、杜义德针对李文率部夺路西逃的动向，立即调整部署，命令12军在邛崃固驿镇一线构筑工事，扼守阵地，堵击李文兵团西逃；16军由蒲江地区向北推进至复兴场、寿安场一线，配合12军进行侧击；18军53师急进至寿安场，配合以上两军作战；10军占领新津后，以主力出新津西南，实施尾击；11军在新津以东至简阳一带堵击可能南逃的国民党军。随后，刘伯承、邓小平又命令18兵团迅速向成都及其以东地区前进，围歼可能向东逃窜的国民党军，并准备进占成都。

李文突围受挫，恼羞成怒，25日再次组织突围，并亲临督战，绝望地向属下叫喊“拼光亦光，不拼亦光”，胁迫官兵

反复向邛崃、大邑一线的我 12 军阵地突击，其佯攻部队亦同时向邛崃进攻。我军战士面对敌人疯狂的进攻，高呼着“不让一个国民党兵逃走”的口号，互相鼓励，英勇抗击，激战一天，12 军的阵地岿然不动，李文部始终未能前进一步。

国民党军左路见李文亲督主力突围不成，遂于 25 日黄昏在猛烈炮火支援下，集中兵力连续猛攻邛崃、蒲江间的我 16 军阵地。防守该地的我 138 团奋起反击，打退敌人的多次猛攻。战斗进入相持状态，必须改变战术，才能出奇制胜。战斗英雄、3 营副营长桑金秋，按照指挥员的命令，率领 7 连，利用夜暗，沿着沟壑，悄悄地插到国民党军侧后 5 公里多的地方，突然发起进攻，连占两个山头，俘国民党军 1 个营又 2 个连。随即，他又指挥 7 连居高临下向国民党军的炮兵阵地射击，同时不断改换位置打信号弹，吹冲锋号以扰乱敌方，国民党军误以为我军主力深入，惊恐万状，不得不停止进攻。

此时，我一野 18 兵团正在快速前进，其 62 军已直逼广汉，60 军也占领新津地区，61 军则抵达涪江东岸，堵歼可能向东北方向溃逃的国民党军。四野 50 军也日夜兼程抵达简阳地区，并沿沱江一线展开，堵击可能东突的国民党军。在北线、东线步步紧缩对成都地区包围圈的同时，西线、南线之我 3、5 兵团主力，于 26 日凌晨对被围于天津地区的李文兵团发起全线进攻，将其割裂成小块，使其相互间失去联系，节节败退。战至黄昏，逃到邛崃西南的李文兵团已溃不成军，完全丧失了战斗力。12 月 27 日，李文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得率 5 万余人向我军投降。

与此同时，国民党军 18 兵团司令官李振率部在成都以东地区起义，成都城内的宪兵部队等也相继起义。至此，成都战役胜利结束。胡宗南集团和退缩成都地区的其他国民党军共 30 余万人，除少数溃散后潜往西昌地区外，大部起义投诚，余部被歼，从而使蒋介石妄图背靠康滇，盘踞川西、负隅顽抗的计划彻底破产。

1949 年 12 月 30 日，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热情欢迎下，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副政治委员李井泉率 18 兵团领导机关偕 60 军进驻成都，值此，四川全省宣告解放。

然而，挺进大西南的刘邓大军在完成千里大追歼，突破国民党军重重防线，于敌刚刚完成战略大决战，接管城市，建立政权、剿灭残敌等工作尚待展开之际，其所属的几支主力部队均被陆续调往群山叠障、沟壑纵横的朝鲜战场参战。

从海南岛回师鸭绿江

1949 年 11 月 6 日至 12 月 14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遵照中央军委的部署，胜利举行了广西战役，歼灭了国民党白崇禧集团及余汉谋集团余部，解放了广西全境及广东雷州半岛。

中南大陆解放后，与之隔海相望的海南岛，便成为我军下一步的进攻目标。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央军委的布署，四野前指命令其所部 40 军、43 军和加农炮兵 28 团、高射炮兵 1、9 团及工兵部

队一部，共约 10 万余人组成了渡海作战兵团。这次海南岛战役，由中共华南分局统一领导，15 兵团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赖传珠、第一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洪学智和第 12 兵团副司令员韩先楚具体负责指挥实施，并在琼崖纵队的配合下进行。

毛泽东的多次指示，引起了中共华南分局领导人的高度重视。1950 年 2 月 1 日，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15 兵团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会赖传珠三人在广州专门主持召开了解放海南的作战会议。

40 军军长韩先楚(兼)、政治委员袁升平，43 军军长李作鹏、政治委员张池明和琼崖纵队副司令员马白山、参谋长符振中等高级指挥员到会分析研究了当时的敌我双方态势。

会议认为，有利于我军的因素是我参战部队士气高昂，战斗力强，海南岛海岸线长，登陆点多，便于偷渡与强渡，另外，有熟悉地形及敌情的琼崖纵队全力接应和有根据地可以立足。不利于我军的因素为没有单一的陆军渡海作战经验，没有海、空军提供掩护和支援。加之船只不足，而敌方却占据着海、空军优势，武器装备亦较好，因此，其必然会依仗琼州海峡为天然屏障进行垂死挣扎。

鉴于我军发起战役唯一的渡乘工具就是木帆船，要在 10 余海里宽的海峡强渡，突破敌强大的海、空军力量组成的封锁网是关键。

在这次作战会议上，指挥员们经过慎密的思考，最后确定了海南战役的作战方针：采取分批偷渡与主力部队强渡相结合的战术。首先组织小股部队分批偷渡上岛，与琼崖纵队会合后

增强岛上我军作战力量，尔后，再以主力部队实施大规模的强渡进攻，以最后全歼该岛守敌。

渡海作战兵团根据四野关于“派出少数兵力携带电台偷渡一次，取得渡海经验”的指示，决定抓住岛上敌守军抽调兵力“清剿”琼崖纵队，两翼防卫力量相对薄弱的有利时机，安排 40 军和 43 各组织 1 个加强营的兵力，分别向琼东北和琼西北两侧地区进行偷渡。

1950年3月5日19时，由 40 军 118 师 353 团 1 营 800 名将士组成了第一个渡海先遣营。该营在 118 师参谋长苟在松的带领下，乘 13 艘木帆船，从雷州半岛西南端的灯楼角起航。临行前，兵团司令员兼 40 军军长韩先楚将一面绣有“渡海先锋营”几个大字的红旗授给该营，使肩负重任的指战员们深受鼓舞。

先遣营的 13 艘战船起航后，顺风顺流，直向预定目标——琼西北白马井登陆点驶去。然而，当他们距岛滩约 30 海里时，风突然停止了，木船只能靠人力划桨摇橹而行，航速缓慢，使先遣营按原计划于拂晓前在白马井靠岸的设想不得不改为灵活处置。

在这紧要关头，先遣营的总指挥——118 师参谋长苟在松立即下令各船组织好机炮火力，做好应付敌海空军突然袭击的战斗准备。

3月6日拂晓时分，我军战士发现附近有几十只国民党军帆船行驶，为了隐蔽行动，先遣营指挥员要求船队伪装成民船，尾随敌之船队行进，当遇上敌海上巡逻机侦察时，战士们

便摹仿前面的敌船的做法，给予相应的回应。这一招，居然骗过了天上的敌机。

中午 13 时，先遣营船队终于接近了预定的登陆点，可惜，此时我军已无法隐蔽登陆意图，被岛上守敌发觉，只得与之交手。

海面上，有敌 2 艘军舰对我船队实施猛烈炮击；空中，10 架敌机俯冲扫射，岸上 1 个营的敌军则依托坚固工事进行阻击，妄图在我军尚未踏上沙滩之前，将我偷渡部队消灭于海上。

我先遣营的 800 壮士，面对血与火的生死考验，临危不惧，一面勇猛地进行火力还击，一面奋力划桨，直逼岛岸滩头。

14 时许，先遣营在火速赶来的琼崖纵队一总队 8、9 团的攻击接应下，终于击溃了登陆点守敌的阻击，一举登岛。

第一个渡海先遣营的作战成功，不仅极大地鼓舞了渡海作战兵团全军上下的士气，而且为后续部队的偷渡及正面强渡都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4 天后，由 43 军 128 师 383 团 1 营及配属的 92 步兵炮连共 1000 多名指战员组成的第二个渡海先遣营在 383 团团长方春的带领下，分乘 21 艘木帆船，于当日（10 日）13 时从湛江市东南的硇洲岛拔锚起航，扬帆直取琼东北地区的赤水港。

这一次侧翼偷渡，虽然未遇敌海空军的海上袭击，但是却碰上了恶劣天气，当夜海面上风雨大作，狂风卷着巨浪肆虐，使先遣营船队的指战员们同样面临生死考验。

在有的帆篷被狂风撕破、有的桅杆被折断、有的船舱给巨浪击穿的情况下，经过 20 个小时的艰难航行，将士们方才在第二天（11 日）9 点左右在琼东北地区赤水港至铜鼓岭一带 30 公里的地段上分散登陆。

43 军 128 师 383 团 1 营组成的这支 1000 余人的偷渡部队登岛后，由于通信联络不便，只好就地分散隐蔽。好在负责接应任务的琼崖纵队独立团与当地群众一起，通过种种努力，设法将部队一批批带到了预定集合地点，并以勇猛动作，一鼓作气突破敌守军一个团的封锁，于 12 日晨到达文昌地区。

解放军两批偷渡部队的登岛，令吹嘘防御体系“固若金汤”的薛岳气急败坏。他忙调集了 6 个团的兵力进攻文昌，企图趁我 43 军渡海先遣营立足未稳之际，一举围歼之。

先遣营不久果然在潭门一带遭到敌暂编 13 师 1 个多团兵力的钳形包围，形势的确对我不利。

战斗打响后，该营 2 连连长李树廷发现敌 37 团的团指挥所就在附近山头时，立即派出 1 个排向其发动正面佯攻，而自己则带领 1 个班从侧面冲进敌团指挥所，当场击毙该团团长。敌兵失去作战指挥，首尾难顾，在我军战士们的奋勇拼杀中，争相逃命。

就这样，该营在琼纵独立团和当地群众的紧密配合支援下，不仅全歼了敌暂编 13 师 37 团的 1 个营，而且还击溃了这个师 39 团的进攻。

我军两支渡海先遣营偷渡登岛后，虽然为此次海南战役提供了宝贵的海上作战和登陆抢滩以及突破敌军围追堵截等方面

的组织经验，但要接应整个兵团的大规模强渡海峡登岛，显然仍然显得兵力过于单薄。为此，兵团指挥机构决定，由 40 军和 43 军再各派 1 个加强团，向琼北地区实施正面偷渡攻击。

1950 年 3 月 26 日傍晚（19 时），由 40 军 118 师 352 团主力和 352 团 2 营及炮兵大队组成的第 1 个先遣偷渡团的 3000 名指战员，在琼崖纵队副司令员马白山和 118 师政治部主任刘振华的率领下，分乘 81 艘木帆船，仍从雷州半岛西南端的灯楼角起航，向着琼西北的临高角一路顺风而去。

但不巧的是，出航仅 1 个多小时，由于风力骤降，航速减慢，各船只好落下帆篷，由战士们划桨行船。到了下半夜，海面上气温下降，大雾弥漫，数米外便不见人物，而且此刻潮流流向也发生了变化，致使加强团船队无法继续保持队形，各级指挥员只得依靠手中的指北针判定方位指挥前进。

为了坚决完成正面偷渡登陆作战任务，加强团指挥所命令各营领导，即使在失去统一指挥的情况下，也要以船为单位，只许前进不许后退，那怕只剩下一条船也要抢滩登陆，表示了誓死完成任务的坚强决心。

在一夜大雾的掩护下，到第二天上午 5 时至 8 时，该加强团各船先后在偏离预定地点较远的临高角以东 20 公里宽的滩头地段分散登陆。

船向的偏离，将加强团的指战员们送到了琼岛守敌正面防御能力很强的区域，使他们经受了比前两批偷渡部队更加严峻的战火洗礼。

由于远离预定登陆点，岛上的琼崖纵队一时难以接应，加